

横议集

张中行 著



横议集



张中行 著

7/10

封面题字 启 功
责任编辑 金辉 张马
封面设计 赵子航
版式设计 张 马

横 议 集

张中行 著
徐秀珊 编

出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新街口六条红园胡同8号 邮编：100035）

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二二〇七工厂

850×1168毫米 1/32 8.25印张 175千字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 7-80118-132-8/F·132

定价：11.8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邮编：100836）

自序

《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读去声）议。”“横”是放肆，与我昔日的养生之道“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不合，可是放在近年写的一些述个人私见的文章的头上却合适，所以旧料新裁，就取为书名。说合适，取义不是我的胆量已经大到心里有什么，纸面上就写什么，而是人微如我，拿起笔，不“吉甫作诵”而常常发点小牢骚，有违温柔敦厚的诗教，应该说是过于放肆了。

敢放肆，主要是由于近年来的环境有变。而“想”放肆就不然，是来于“天命之谓性”的人各有见；有见，就如邻居二大妈之听到什么小道消息，憋不住，想立刻找另一个二大妈说说。这样说，放肆也是来于“天”，所谓不得不然。可是“天”，其下隔一个“地”，还有“人”，就带来复杂。比如说，你本于天，生来是既怕苦更怕死的，只是因为高高在上者不愿意听，或需要你不怕苦、不怕死，你就只好改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人造的严酷的一路，必须放弃人各有见，顺着高高在上者说。而万幸，严酷的路也会有曲折，于是而来了环境有变，你说怕死，不算犯罪，说怕苦，也可以谅解。但是，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说，扑灭人各有见，是高高在上者错了？依我国“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

天子出”的传统，高高在上者错了是他自己必不承认，也不许别人说的。不许说而说，是不打折扣的放肆，我心向往之，手却还苦于跟不上。换为由正面说，这里横议的“横”是有限度的，限度是，虽然有些牢骚，却还不至“得罪于巨室”。

“不得罪于巨室”是世故的一面。但还有另一面，是我，算作吹牛也罢，也常说的：所想的未必写，所写的却必是所想的，即自己信为真的。这所信，有些也许是惯于背诵子曰诗云的人不这样想的，甚至高高在上者不愿意听的，但惟其有些人不这样想，高高在上者不愿意听，小而讲修齐，大而讲治平，也许更值得参考一下吧？所以就不避烦琐，把年来发表于报刊的这类文章集起来，再印一次，以期有逐臭（胡思乱想加胡说八道）之癖的读者既可以省翻检之劳，又可以一网打尽。积少成多，成堆之后看看，有些篇幅较长，像是站在讲台上讲的，有些篇幅较短，像是坐在树阴下谈的，大人国与小人国，以分治为是。所以由徐秀珊女士主其事，先编小人国的《说梦楼谈屑》，交北京出版社出版；剩下大人国的，仍由她编成，就是这本《横议集》，数量不很大而（我觉得）分量较重，也就双手捧之，敬呈于肯赏光的读者的慧目之前了。

吾从众，能印一本书，得些小名小利，要“心念旧恩”，谢这位，谢那位。我近年时间精力都不够，许多事不得不求人，编书，以徐秀珊女士帮助最多，这一本又是她，所以要谢。其次是张马先生和金辉女士，没有他们的热心，这本书是不能如此顺利地问世的，所以也要谢。还有题写书名的启功先生，——其实不谢也罢，因为我每印一本，他必题，我必谢，他的美尼之耳想必早已听腻了。

张中行

1995年8月22日于元大都健德门外新居

目 录

自 序	(1)
一 怀疑与信仰	(1)
二 关于读书明理	(7)
三 难矣哉如释重负	(16)
四 何须蜀道问君平	(27)
五 月是异邦明	(35)
六 易地则皆然	(43)
七 闲话古今	(51)
八 由吴起起的东拉西扯	(59)
九 读《汉书·苏武传》	(64)
一〇 《洛阳伽蓝记》里的 一点牢骚	(72)

一一	有关史识的闲话	(77)
一二	刚直与明哲	(87)
一三	牢骚和歌颂	(90)
一四	直言	(95)
一五	看闲书一得	(100)
一六	吃皇粮与颂皇权	(103)
一七	再谈帝王历史剧	(106)
一八	赋得读书人	(111)
一九	关于反观乎己	(115)
二〇	寿则多辱	(119)
二一	生的小反抗	(124)
二二	长物与戒之在得	(133)

二三	关于吾师	(139)
二四	汉学与轻信	
	——读《胡适选集》	(145)
二五	有关俞瀚的一点资料	(149)
二六	再谈俞瀚及其他	(154)
二七	又一次热闹	(159)
二八	红学献疑	(164)
二九	锦瑟无端	(172)
三〇	有关史论的杂想	(108)
三一	解说八股	(184)
三二	弗洛伊德，吾之师也	(188)
三三	笑与泪	(193)

三四	“禅”的禅外说	(197)
三五	关于学文言	(207)
三六	谈谈文言教学	(226)
三七	使动、意动等说质疑	(236)
三八	自省	(244)
三九	动笔前想想如何	(248)
四〇	应唯物而未唯物	(252)

编后记	徐秀珊 (255)
-----------	-----------

怀疑与信仰

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的人来，说今年是建校九十周年，想印个纪念文集，希望我写点什么。我有些胆怯，因为没有什么值得听听的话好说。但又义不容辞，这有如为亲长开个纪念会，不管我怎么可有可无，也非参加不可。问内容有没有什么限制，说要围绕“我与北大”写。写什么呢？大事，没有；琐细，敝帚享之千金，读者会厌烦。困难中想出一条路，几年以前，感到衰迟之来，常常更加怀念昔年的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境，于是把一时的记忆和观感写下来，零零碎碎，集到一起出版，名为《负暄琐话》。其中不很小的一部分是谈我上学时期的北大。“我与北大”，命题作文，我算是已经写了后一半。还有前一半，“我”，没写，这次就无妨以此为内容，算作补阙或拾遗。

写“我”，选与北大有关系的，也太多了。多，无妨，篇幅可以拉长。有妨的是性质太细小的，如饥餐渴饮，太偏僻的，如个人恩怨，都不值得说，因为，用时下的话说，是没有教育意义。想了又想，想出上面那个题目，自己认为，分量超过饥餐渴饮，可

以说说。由己身出发考虑，也应该说说，因为它，作为问题，已经伴我或说缠我几十年，而且看来还要缠下去，直到无力再想它。是什么问题呢？记得是当年读英国培根的书，大概是《新工具》吧，问题的性质才明朗化的。培根说：“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我以很偶然的机会，走进北京大学的门。在母校的培育中生长，学会了怀疑；不幸半途而废，虽然也希望，却没有能够“终于信仰”。这不知道应该不应该算作辜负了培育之恩；但思前想后，心里却是有些感慨的。以下就围绕着这点意思，说说有关的情况。

想扯得稍远些，由迈入校门的偶然说起。那是1931年夏，我师范学校毕业，理应去教小学而没有地方要，只好换个学校，升学。北大考期靠前，于是交了一元报名费，进了考场。记得第一场考国文（后来称为语文），作文题是八股文的老路，出于《论语·季氏》，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那时候还没念过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不知道原文有错简（应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于是含糊其辞，在“寡”“贫”方面大作其经义式的文章。其间并引《孟子》为证，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云云。这里要插说几句话。我小学的启蒙老师姓刘，名瑞墀，字阶明，是清朝秀才。以会作破题、承题、起讲的大材而教“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心里当然有些不释然。于是锥处囊中，或由于爱人以德，就自告奋勇，晚上给我们一些也还愿意听听的孩子讲《孟子》。他的教法革新了，是先讲解，后背诵。河内凶这一章靠前，记得牢实些，所以能够抄在考卷上。其时北大正是被考古风刮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推想评卷者看到纸上有《孟子》大文，必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是给了高分。其他数学、外语等都考得不怎么样，可是借了孟老夫子的光，居然录取了。

录取为文学院学生，选系，听了师范同学也考入北大的陈世骧（后到美国教书，已故）的劝告，入了中国语言文学系。那时

候，文史哲几乎不分家，于是听课，杂览，就三方面都有。主干是温故，也想考古。考古要大胆怀疑，如顾颉刚先生那样，说夏禹王可能是个虫子。又要小心求证，于是就不能不多翻书。现在回想，其时的生活是在两条线上往前走，一条可见，一条不可见。可见的是上课，钻图书馆，心情有如乡下人进城，大街小巷，玉钏朱轮，都想见识见识。具体说，也听了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课；图书馆呢，由板着脸孔的正经正史等一直到《回文类聚》和《楹联丛话》之类，都翻翻，这，吹嘘一点说是走向博，其实是“漫羨而无所归心”，关系并不很大。关系大的是那条不可见的，默默中受北大精神的熏陶。这精神是两种看来难于协调的作风的协调。那是一，乱说乱道；另一，追根问柢。或者合在一起说，是既怀疑又求真。说这关系大，是因为它指引的方向不只是浮在水面的博，而是走向水底的深。表现于外是口说笔写，要确有所见，不甘于人云亦云。

这当然是说学校，不是说我也这样有所得。但是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想出淤泥而不染也做不到。这说来话长，只好大题小作。大概是学程四年的后期，追根问柢和怀疑互为因果，使我的兴趣或说思想有了较大的波动。原想写的《九鼎考》扔下了，认为即使考清楚了，与现在又有什么关系？重要而迫切的是要弄明白，“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说通俗点是怎样活才不是白白过了一生。这使我相当惶惑。只是惶惑，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太大。有眼不识泰山，于是问人，以为轻易可以解决。只有两次，印象深，还记得。先一次，大概是问比较活动的什么人吧，答复是要读政治经济学。读了一点点，觉得不对，因为那只是讲怎样求得温饱，并不讲为什么要温饱。后一次，是问在生物系上学的牛满江同学（现在美国），生物的生有没有目的，他想了想，答，传种之外像是没有目的。我当然不满足，因为这不是值得夕死的道。是母校的追根问柢精神使我怀疑，又不甘

于停止于怀疑，于是我不能不摸索着往前走。

近水楼台，先注意本土的所谓道。这也多得很，其显赫者是儒道释（外来而本土化）。儒接近常情，有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如果不追根问柢，这种道颇有可取，因为即使学周孔、秦皇汉武很难，努力，写点什么，总不至于可望而不可即。问题是这种道并不是人人都同意，如老庄就是主张好事无所谓的；佛家更趋极端，认为这都是彼岸的事，不只空幻，而且不免于苦。更大的问题来自理论方面，是，为什么不朽就可取？追到最后，恐怕只能乞援于《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说得雅驯，其实性质与倒霉，死于车祸，只好认命，正是一路。上天让我们乐生，求饱暖，我们除了顺从，还有什么办法？

母校的追根问柢精神使我不能停止于顺天，于是冥思，也找书看。书的范围，一言难尽，总之是这条弯路相当远，日久天长，甚至发现日暮途远，想倒行逆施也难于做到。而所得呢，又是一言难尽。情况可能与宋朝的吕端相反，是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所谓大事，是道的理的一面，还是找不到可以贯通一切并为一切之根据的什么，换句话说，是还不能树立起信仰。所谓小事，头绪纷繁，这里只说两类值得一提的。一类是道的行的方面，我不得已，思想上只好走写《逻辑系统》的英国小穆勒的路，他中年也烦闷，找不到可以为之夕死的道，后来左思右想，接受了边沁主义。儒家的顺天命，加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边沁主义一路，我同意，理由不是认为这样最合理，而是为多数人着想，只能这样。这态度，由理论上衡量，是不怎么积极的，因而就给持不同意见者，如佛家，留下余地，他们不高兴在此岸，那就到彼岸也可以，只要说得到做得到就好。小事的另一类是熟悉了大问题之下的诸多小问题。举有实用价值的为例，我不再怕鬼，因为确知现实世界没有《聊斋志异》写的那样有情，人死如灯灭，就是想鬼也没有。绝大多数也许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总的

说，是常用较冷的眼看一切。这样看，事物就常常不像说的那样单纯，接受整体之前，要分析。就是说，还是怀疑的精神占了上风。其间一件小事更可以说明这种心情。那是读英国罗素的《怀疑论集》，现在还记得有一处说，历史课本讲打败拿破仑，英国的说功都是英国的，德国的说功都是德国的，他主张课堂上让学生兼念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不知所措，他说，能够教得学生不信，就成功了。我欣赏他这个意见，因为是擂鼓助了怀疑之兴。

这样说，心里长期盘据着母校的怀疑精神，我就毫无遗憾吗？也不然。值得说说的是两种情况。

一种偏于世俗，是应付社会的捉襟见肘。世间有些事物，有些人看着完全好，或完全坏。我却常常不这样看。问我，窥测对方的意旨说，不好；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也不好。怎么办？因为难办，也就难说，这里只好不说。

一种偏于微妙，是知心安理得之为绝顶重要而不能心安理得。记得这种心理状态不只一次跟深知的人说过。我外祖母是个乡下老太太，信一种所谓道门，精义不过是善心善行得善报。有一次，我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说并无来世，惹来几句咒骂。现在想来，这是怀疑和信仰的交战，哪方胜了呢？外祖母有信仰，当然相信得全胜。我呢，仔细想想，是胜败难说，因为来世虽然靠不住，但那是信仰，有大用，用佛家的话说，是可以了生死大事。死生亦大矣，无妨缩小一些，说心安理得。而我，因为没有外祖母那样的信仰，一直是连缩小的心安理得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细想起来，这心情是有些苦的，记得前几年曾写几首观我生的诗，其中第二首的尾联是：“尿溺乾元参欲透，玄功尚阙祖师禅。”这可以最简要地说明我与北大的关系：是母校的怀疑精神引导我去思索道在尿溺，思索乾元亨利贞；可是自己琢而不成器，始终不能禅悟，见到如能朝闻则夕死而无憾的道。

善心善行得善报，报要由至上的外方来，待报，不问至上的

有无，何形何质，何自来，是信仰。更典型的信仰是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给我们福，要感谢，给我们祸，也要感谢。相信某种说法永远是真理也属于这一类。树立这样的信仰并不容易，因为与追根问底的精神不能水乳交融。一种美妙的想法是使怀疑和信仰共存共荣。这做得到吗？我不知道。也许培根有办法，可惜不能寻其灵而问之了。另一种，不是美妙的，只是实际的想法，是分而治之。分是照古人的说法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然后是上不能知，存疑，专顾下。以《中庸》的话为例，“天命”是形而上，可以不问理由，只是接受；然后用全力钻研“率性”，以解决夫唱妇随、柴米油盐等问题。其实，古今中外无数的贤哲，更加无数的常人，都是这样做的。名堂可以叫得冠冕些，如以仁义王天下，边沁主义，等等，用庄子的话一言以蔽之，都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这类既复杂又朦胧的问题上，我因为死抱着母校的怀疑精神不放，虽然也知道，分而治之之后，应该尽量少问形而上的道，以求在形而下的范围内徜徉，取得微笑；可是总认为，这低一层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想法和做法还是无根之草，或根不深之草，是长得并不稳固的。

越说离实际越远，应该就此打住，回到本题。意思很简单，是，如果人可以切为身心各半，我的心的一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是在母校怀疑精神的笼罩下，摸索着走过来的。这使我有所得。但没有大得，因为未能“终于信仰”。这样说，对于母校，我的心情也就不能不分而治之：有时感到惭愧，因为没有成材；有时也感到安慰，因为没有忘本。

关于读书明理

写这样一个大题目，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不得不说说来由，而说就不免话长。是几个月以前，看到，更多听到，讲《易经》的书多种多样，大走其运，印数多，销得快。相形之下，我的拙作是既印数不多，又销得不快。我惭愧，没有安分守己的修养，又没有沉默的习惯，于是写了一篇不信占卜预言、不信神秘主义的文章，题目是“何须蜀道问君平”，刊于《读书》1991年3月号。问世之后，推想会引来讥笑，是你浅陋，不理解视听所及背后所谓底蕴的奥秘，所以才信口雌黄。很意外，讥笑还没来，却接到不相识的一位女士的电话，除了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之外，还谈到同是读书而所见不同等等问题。为时间所限，我只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待有机会详谈云云，结束。其后想了想，说很复杂，大概还是低估了，因为书，四部九流，花样太多，而读的人，天之生材不齐，又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此外还要加上公的时风和私的利害，于是同一事物，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就不足为奇了。彼此是非不同，是庄子的看法。还有常人的行事，是各是

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有没有客观的是非？是非有知识论的和道德学的两种意义：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还是癸未除夕，是知识论性质的是非问题；王国维应否自沉于昆明湖，是道德学性质的是非问题。知识论的比较简易，因为，至少是理论上，弄得水落石出是可能的。道德学的应否就不然，因为定应否，要有个比“事实”远为玄奥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经常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就又回到上面提到的问题，究竟有没有是非？我不得不承认有，因为不承认，这篇文章就不必写了。可是承认，尤其道德学方面的，想说清楚就真是一言难尽。不得已，只好避难就易，或说取巧，有言在先：一，以假定大多数人会默认为依据，多说是非而少说标准；二，读书与明理的关系，表现在人和事上千头万绪，这里只谈一点点，来于偶然想到，自认为还值得注意的。

以下入本题。不幸一开头就遇见缠夹二先生，是：读书可以明理，不读书可以明理，怎么说都不对，或不全对。说对不对之前，先要谈谈理是怎么回事。宋儒说万物只是个理，用现代化的帽子扣是唯心论；但理的范围却未必能够因此缩小。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会（可能义）掷骰子，是人事外的世界有理可循。人事之内，大到国与国间，小到马路上的人与人间，大家都承认，要讲理。这里只得损之又损，单说人的思和行，所谓合理，一方面，是能够与事实印证；另一方面，是不违背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之德。用反面的小事来说明：晨起鹊噪，以为必有客人来，而终日门庭寂然，可见这所信并不合理；看别人的钱包眼红，窃为己有，损人肥了己，就是窃者自己，除非以梁山泊的替天行道为理（仍不能离开理）由，清夜自思，也当觉得于理有亏吧？就凭这个存于人心的恍兮惚兮的有道理、不讲理等等之“理”，以下谈读书与明理的关系种种。

循某下世名人喜作翻案文章之例，由反面下笔，是读书也可以不明理。这还有等级之差，或性质之别，想由显而隐说三类。